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从马克思主义诞生至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

第 二 卷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编写组

人 民 出 版 社

第 六 章

第二国际的创立及其前期活动。

恩格斯为捍卫无产阶级 的革命路线而斗争

19 世纪 90 年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继续向横广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得到进一步的传播，社会主义政党在更多的国家内创立起来，职工会组织在欧洲、美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中得到广泛的发展。在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发展的基础上，由恩格斯领导，于 1889 年 7 月建立了第二国际。第二国际在前期活动中召开了四次代表大会，即 1889 年巴黎代表大会、1891 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93 年苏黎世代表大会、1896 年伦敦代表大会。这些大会清算了无政府主义，制定了一些有关工人运动的方针和政策。但是，第二国际各党忽视了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因此，右倾机会主义日益滋长起来。恩格斯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这种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为此，他发表了被德国党的领袖们隐藏了达 15 年之久的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写了《法德农民问题》、《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等光辉著作，有力地批驳了右倾机会主义。第二国际前期的工作基本上是肯定的。1895 年恩格斯逝世后，机会主义全盘暴露，出现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

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① 国际马克思主义者为保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对修正主义进行了斗争。第二国际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对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米勒兰主义进行了一定的斗争。但在合法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未能将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这一任务后来是由伟大的列宁完成的。

第一节 第二国际的创立。恩格斯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一 恩格斯是创立第二国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第一国际解散后，无产阶级团结的伟大思想仍然铭刻在各国工人的心坎中。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各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曾多次倡议重建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但由于客观条件不成熟而未成功。

马克思、恩格斯密切注意建立新的“国际”的问题，并对未来新“国际”提出了比第一国际更高的要求。1874年9月12—17日，恩格斯在致左尔格的信中写道：“我相信，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多年的影响以后——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② 他在1882年2月10日致约·菲·贝克尔的信中说：新的“国际”“再也不会是一个宣传的团体，而只能是一个行动的团体了”。^③ 显然，建立这样一个组织，需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22页。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3页。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68页。

要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准备。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拒绝一切为时过早的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的倡议。在这封信中，恩格斯答复约·菲·贝克尔1882年2月1日来信中提出恢复“国际”问题的建议时说，实行这个建议的条件尚不成熟，但相信这个时机很快就会到来。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独一无二的领袖。在80年代，恩格斯除了进行巨大的科学工作（主要是编辑和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手稿）外，在指导各国工人运动和准备建立新的“国际”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到80年代末，客观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出现了新高潮，欧美有许多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各国都涌现出一批有威望的工人运动的领袖，各国工人要求加强国际团结、共同反对资本奴役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所有这些，给建立新的国际组织准备了必要的客观前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1887年的圣加伦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最近期间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决议。法国的盖得派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但德国党和法国的盖得派行动非常迟缓。

当马克思主义者着手建立新的国际组织时，以马隆、布鲁斯等机会主义者为首的法国“可能派”纠合英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联盟”、英国工联以及美国的“劳动骑士团”^①等组织，1888年在伦敦召开了所谓世界工人代表大会，决定1889年7月在巴黎召开由他们“发起”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并成立第二国际。“可能派”及其同伙这样作的目的是企图夺取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使日益发

^① “劳动骑士团”是19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存在于美国的一个组织，它主要联合了非熟练的工人。这一组织的黄金时代是1886年，当时它拥有成员70多万。它主张阶级合作，否认政治斗争，幻想通过合作社把工人从剥削中解放出来。

展的工人运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并把它引向社会改良主义的轨道。

由谁掌握领导权是决定“国际”性质和命运的关键问题。如果机会主义者的阴谋得逞，将会给国际工人运动造成巨大的损失和危险。以威·李卜克内西、倍倍尔为首的德国党的领袖们，不仅未及时与“可能派”进行斗争，反而对“可能派”的倡议感到兴趣，甚至停止自己的准备工作并与“可能派”进行谈判。德国党内有的人还主张参加“可能派”的代表大会。这意味着德国党预备放弃新“国际”的领导权。在这个紧急关头，68岁的恩格斯毫不迟疑地放下其他工作，象青年人一样，火热地投入了反对“可能派”和领导建立新“国际”的斗争。

恩格斯认为，首要的问题是揭露并彻底粉碎“可能派”，使工人群众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的界限。因此，恩格斯在给他的学生和战友的许多通信中，无情地揭露了“可能派”的反动本质和它的机会主义路线。他写道：“问题主要是在于：过去国际中的分裂和以前在海牙的斗争，又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也是我大力进行工作的原因。对手还是过去那个，只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已经换成了可能派的旗帜；同样是向资产阶级出卖原则，以换取小小的让步，主要是为几个领导人谋取一些肥缺（市参议员、劳动介绍所的领导人员等等），而策略也还是过去那一套。”^①

在反击“可能派”的斗争中，恩格斯耐心地帮助了当时最有影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的盖得派。恩格斯批评了威·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的犹豫不决和调和主义态度，批评了盖得和拉法格行动的迟缓。恩格斯当时气愤地说，“可能派奔走张罗，而我们

^①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89年6月8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6页。

的人却在睡大觉。”^①他号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抓紧时机，从“可能派”手中夺回创立新“国际”的主动权。在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威·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盖得、拉法格等著名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很快改变了态度，积极行动起来。德国年轻的女革命家克拉拉·蔡特金（1857—1933年）也积极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1889年2月在海牙召开了预备会议，决定在同年7月，即“可能派”开会的同时，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两个大会相形对照下，让工人群众识破“可能派”的机会主义本质和卑鄙阴谋。恩格斯所进行的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活动，保证了第二国际得以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建立起来。

二 国际社会主义者 1889 年巴黎 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的创立

在恩格斯领导下，经过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1889年7月14日，即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攻破巴士底监狱一百周年纪念日，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巴黎开幕。出席大会的有22个国家的393名代表，其中很多人是各国工人运动的积极活动家。革命导师恩格斯因忙于《资本论》第3卷的整理工作，未能出席大会。与此同时，“可能派”所主持的代表大会也在巴黎开幕。但参加者主要是法国人。在大会的550多名代表中，法国人占477名。而英、美、西、意、比、葡、波、奥、瑞（士）等9个国家的代表总共只有80来人，而且差不多都是工联主义者。从大会的代表成分来看，这个大会是名符其实的“可能派”的代表大会。这一事实表明，“可能派”夺取新“国际”的领导权的阴谋被粉碎了。

^① 列宁：《〈约·菲·贝克尔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700页。

参加前一个大会即第二国际成立大会的代表中，除了马克思主义者外，还有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改良主义者。会议一开始，比利时、荷兰、英国、意大利、丹麦等一些国家的代表主张不惜任何代价同“可能派”的大会合并。纽文胡斯、凯尔·哈弟、德·柏普等大力宣扬两个大会合并的好处和必要；德国、法国、瑞典、挪威和一部分英国的代表坚决反对合并。法国盖得派的特列索尖锐地指出：“可能派”是资产阶级的代表，社会主义者不能同敌人合并。这种意见得到盖得、拉法格、龙格等人的支持。一直抱有调和主义情绪的威·李卜克内西这时也提议：只有在“可能派”承认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的原则下才能合并，否则合并就是有害的。大会经过长时间激烈的争论，最后通过了威·李卜克内西提出的依据上述原则可与可能派进行谈判的决议。恩格斯在给左尔格的信中分析这场争论时指出：“在合理条件下的联合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有些人受这种热潮影响，却高喊不惜任何代价都要联合。”^①根据大会决议与“可能派”进行了谈判，但“可能派”大会拒绝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建议。合并的努力失败了。当恩格斯知道大会和“可能派”决裂以后，高兴地指出：“我们那些多愁善感的调和主义者极力主张友爱和睦，结果遭到屁股上挨了一脚的报应。”^②随后，巴黎大会开始自己的工作。

大会共有五项议程，但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劳工立法和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任务。这是当时工人阶级经济政治状况恶化所提出的迫切问题。在讨论国际劳工立法问题时，大多数代表热烈赞成广泛开展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以便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为

①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89年7月17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42页。

②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89年7月20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45页。

了迫使资产阶级政府颁布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劳工立法，同时应当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血腥统治的政治斗争。会上，无政府主义者在“左”的词句伪装下，要求拒绝进行议会斗争和争取社会改良的斗争。他们认为经济斗争、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是徒劳的。另外也有少数代表鼓吹自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滥调，反对进行政治斗争。会议拒绝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要求和某些改良主义的论调，通过了倍倍尔提出的国际劳工立法决议草案。

决议分析说，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结果，使工人阶级遭到愈来愈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因此，必须运用一切手段回击资本主义制度对工人阶级的奴役；应该要求各国政府制定强有力的劳工立法，保障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建立劳动保护制度，保护童工和女工的利益，废除血汗制度和用商品支付工资等等。

为了实现上述决议，大会号召“各国工人组织和社会党立即开始利用一切手段（集会、报刊、请愿、示威游行等）进行斗争，借此来影响本国的政府”。^①

鉴于无政府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的种种错误言论，大会还讨论了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问题，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议指出：制定劳工立法和开展经济斗争，是工人阶级解放自己的“先决条件”，是启发劳动人民阶级觉悟的手段；但是，“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只靠劳工的经济组织（工联和工会）是不够的”，而必须加强“决不与其他政党妥协的社会主义政党”，必须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统治的政治斗争。“只有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在国际上共同努力，只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剥夺资本家阶级的生产资料并把它变为公有财产之后，劳动和人类才能获得解放”。^② 决议的这些

① 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三联书店版第6页。

② 同上书，第4—5页。

内容给了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以有力的打击。

但是，在夺取政权的道路问题上，大会却表现了机会主义的动摇。决议指出：无产者在有选举权的国家里，应当“利用自己的投票权竭力在现存制度下夺取政权”。^①这是对机会主义的让步和妥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其次，大会讨论了关于“五一”国际劳动节问题。为了纪念美国工人 1886 年 5 月 1 日的总罢工斗争和支援美国工人预定在 1890 年 5 月 1 日举行的总罢工，大会根据法、美两国代表的建议通过了关于“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决议。决议指出：“在一个作为永久规定的日子里，组织大规模的国际性游行示威，以便在一切国家和一切城市，劳动者都在同一天里要求执政当局从法律上把工作日限制在八小时以内，并实现巴黎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其他一切决议。”决议还指出：“各国劳动者则按本国条件所允许的方式组织这种游行示威。”^②

这是一个团结国际无产阶级共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决议。它对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锻炼和检阅无产阶级的战斗力量具有重大的意义。

巴黎代表大会讨论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取消常备军和实现全民武装的问题。这是与无产阶级切身利益有关的重大问题。

大会决议谴责了军国主义，指出军国主义和常备军是为资本服务的反动工具；“是实行政变和社会压迫的工具”；是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工具。决议同时指出军国主义的发展、常备军的存在会给人民带来痛苦和沉重负担。因此，决议声称：“公开反对那些作

① 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三联书店版第 8 页。

② 同上书，第 9—10 页。

垂死挣扎的政府所提出的军事法案”，要求“以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决议特别指出只有全民武装起来，才能更好地抵抗外国的侵略。^① 卡尔·李卜克内西称赞这个决议时说：“这个决议对于军国主义的特质比之过去任何一个决议（指第一国际关于军国主义的决议——引者注）都阐述得更为详尽”。^② 不过这一决议有一个重要的缺陷，就是没有把反对军国主义、取消常备军的斗争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

大会听取了各国代表的报告，交换了工人运动的经验和情报。7月21日代表们向巴黎公社的烈士们敬献了花圈，各国代表在讲话中反映了一个共同的思想：“公社虽然失败了——公社万岁！”

巴黎大会是马克思主义获得胜利的大会，是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大会。它对无政府主义的余孽进行了重大的斗争，制定了一些适应当时国际工人运动条件的具体政策和办法，实际上宣告了新的“国际”——第二国际的诞生。所有这些成就和胜利首先应归功于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的努力和斗争。但是巴黎大会对一些露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谬论，如英国代表加尔吉公开声称反对暴力革命，奥地利代表阿德勒宣扬“资本主义自动崩溃论”等等，没有批判，在决议的某些基本问题上存在有机会主义的错误。这表明，第二国际从其诞生起就孕育着机会主义的种子。

和第一国际比较，第二国际有着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较为一致的思想前提。它是各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但是，第二国际从一开始就暴露出它的弱点。第二国际的组织非常庞杂和松弛，参加者除了社会民主党以外，还有工

① 参见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三联书店版第9页。

② 卡尔·李卜克内西：《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12页。

会、合作社、文化团体等组织。第二国际没有正式的规章和明确的共同纲领，没有总的机关刊物。参加第二国际的各个组织也没有统一的名称。甚至在1900年以前第二国际也没有常设的中央领导机构。这种状况，反映了第二国际初期国际工人运动和各国社会民主党内政治思想的复杂性。尽管如此，第二国际的成立毕竟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显著的作用，它促使各国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联合起来，特别是关于“五一”节的决议成了动员和团结国际无产阶级的有力武器。1890年5月1日，恩格斯写道：“今天……，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的战斗力量，它们第一次在一个旗帜下动员成为一个军队，以求达到一个最近的目的，即……八小时标准工作日。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知道：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已经真正联合起来了”。^①

三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非常法令”废除后的危机。

恩格斯反对议会主义、合法主义的斗争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经受了“非常法令”的考验，领导德国工人运动获得了重大的成就。1889年5月有名的鲁尔10万矿工大罢工，标志着德国工人运动发展到一个新时期。恩格斯在1889年6月曾专门著文论述了这一罢工斗争的重要意义。随着德国国内阶级斗争的发展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深，德国议会于1890年1月25日以多数票否决继续延长已施行了12年之久的“非常法令”。1890年2月20日的议会选举中，俾斯麦企图挽回颓局，结果又落了空。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35

^①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4—245页。

个议席。3月20日俾斯麦被迫下台。9月30日反社会主义者法令期满,从10月1日起该法令被废除。俾斯麦用强暴手段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政策至此完全破产。这是德国无产阶级十余年来英勇斗争的巨大胜利。“非常法令”废除后,统治阶级改而实行社会改良的“自由主义”政策。继80年代宣布的一些社会改良法令(如疾病保险法、意外灾害保险法、残废和衰老保险法)之后,1891年又制定了一些改良法令,其中如关于星期日休息、禁止学龄儿童作工、规定最大限度的劳动日为11小时、产妇休假制度等等。统治阶级用“糖饼政策”代替了“鞭子政策”,目的在于蒙蔽无产阶级的耳目,分化无产阶级的队伍,通过缓和阶级矛盾的手段以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当然,这并不是说统治阶级已经放弃暴力手段,遇有必要他们随时都会寻找借口对无产阶级使用暴力。

德国无产阶级斗争的胜利和统治阶级策略的改变立即引起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危机。一部分纠集在保·恩斯特等人周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即所谓“青年派”,在“左”的词藻下疯狂鼓吹半无政府主义的策略观点。他们起来反对党进行议会斗争,反对利用合法地位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责备党执行着保护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机会主义路线。“青年派”粗暴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原则,进行脱离群众的无政府主义的冒险活动,并且胡说他们的活动原则和恩格斯是“一致的”。恩格斯严厉地谴责了“青年派”这种“极端无耻的行为”,同时详细地批判了他们的“左”倾机会主义和半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策略,指出他们的理论观点是一种歪曲得不成样子的“马克思主义”,而他们的策略是断送党的一切事业的“策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倍倍尔的领导下,对“青年派”的半无政府主义立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890年在哈雷代表大会上,“青年派”的领袖表示放弃他们的机会主义立场,并服从党的决议和纪律。事实上,“青年派”并未实行自己的诺言。在

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他们拒绝服从党的决议并示威性地退出党代表大会，最终和党分裂。其中一部分人完全滚到无政府主义方面去了。

与此同时，另一种机会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也非常嚣张，并日益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以福尔马尔、奥艾尔等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适应统治阶级迂回策略的目的，大力宣扬统治阶级“自由主义”政策的“进步”性。福尔马尔认为，政府废除“非常法令”是“对工人真正友好”的表现，因此社会主义者就应当“用友好的手欢迎善意”。他宣扬说，容克资产阶级政府能够按着全体人民的利益行事，社会主义者只要进行宣传教育，争取更多的选票和议员席位，就可以“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他断言未来的社会将是“始终不渝地和平发展”的结果。这实际上是把正当的合法斗争、议会斗争，变成合法主义、议会主义。这种观点和“左”倾机会主义同样是葬送革命事业。然而福尔马尔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在德国党内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回击和批判，反而得到党内一部分领导人如考茨基、伯恩斯坦的支持。甚至党的公认的领袖威·李卜克内西，这时也常常大谈“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们把坚持革命策略的人一律斥之为“无政府主义者”。结果，机会主义的气焰更加嚣张。这表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顽症，远比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更为艰苦和复杂。

1890年10月，德国党在哈雷召开了“非常法令”废除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前德国党的名称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恩格斯的督促下，经过威·李卜克内西的提议，大会决定另拟新的纲领以代替旧的《哥达纲领》。

德国党的纲领对整个第二国际各国党都起着示范的作用，它将影响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方向和发展前途。在这个时

候,如果不坚决打击不断滋长的议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会走上改良主义的歧途,德国党的新纲领就会遭到歪曲,被马克思驳得体无完肤的拉萨尔主义就会复活。因此,恩格斯连续采取了三项有力的措施,对右倾机会主义展开了无情的斗争。

恩格斯于1891年1月,不顾德国党的领袖们的阻挠和反对,迫使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曾被埋没了15年之久的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一文。正如恩格斯所说:“既然哈雷党代表大会已把关于哥达纲领的讨论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所以我认为,如果我还延迟发表这个有关这次讨论的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文件,那我就要犯隐匿罪了。”^①又说:“我的责任就是:纲领一提出讨论,就发表这份手稿”。^②

《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引起了机会主义者的愤怒和不满。有些德国党的领袖甚至公开声明不同意马克思的观点。考茨基在《新时代》上说:“马克思对拉萨尔的看法不是社会民主党的看法”。出自威·李卜克内西手笔的文章也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拉萨尔主义者,他们是社会民主党人”。党的议会代表格里林伯格在议会讲坛上公开声明:“社会民主党并不同意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

鉴于党的领袖们顽固地坚持机会主义的立场,恩格斯在1891年3月趁为纪念巴黎公社20周年再版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的机会,为此书写了一篇很长的《导言》。在这篇《导言》中,恩格斯着重总结了巴黎公社的伟大历史经验,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了用革命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规律,

① 恩格斯:《〈哥达纲领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页。

②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91年2月23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8页。

深刻地批判了迷信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机会主义观念。列宁认为，恩格斯的这篇《导言》“完全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最高成就”。①

恩格斯根据阶级斗争的规律和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就必须拥有自己的武装，必须用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他指出，最近 50 年来在巴黎发生的每次革命中工人总是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提出这个要求的工人们往往还拥有武装；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②

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要想巩固自己争得的统治，不仅要夺取政权，而且还必须炸毁旧国家政权并以真正民主的新国家政权代替它。这是因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③ 恩格斯的这句至理名言，对于第二国际“议会迷”来说是一个最有力的打击。

恩格斯还强调指出：“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④

哈雷党代表大会以后，由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起草了一个新的纲领草案。这一草案虽然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步，拉萨尔主义的残渣已基本上肃清，但仍然带有一些根本性的错误。新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见《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235 页。

② 恩格斯：《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26 页。

③ 同上书，第 336 页。

④ 同上。

的纲领草案表明，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中所提出的警告并没有为德国党的领袖们所接受。

为彻底打破德国党内机会主义幻想，并使党的纲领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恩格斯在1891年6月间又写了著名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即《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一文。按恩格斯说法，此文是为了迎头痛击“那种和和平平的机会主义，痛击关于旧的污秽的东西活泼、温顺、愉快而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调”。^①

恩格斯的批评意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批评了该草案导言中的错误。草案的这一部分是企图说明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活动所追求的最终目的以及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是从理论上阐明社会民主党人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认识和指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一部分应看作是党的最高纲领。但在阐述这些问题时，草案中有一系列理论上的错误。为此，恩格斯提出了二十余条批评意见，对草案导言逐字逐句地进行纠正和补充。第二、第三部分批评了草案中的政治、经济实践纲领。第二部分即政治部分是恩格斯批评的重点。

在对政治要求部分的批评中，恩格斯阐述了三个问题：（一）关于共和国问题；（二）民族问题和国家结构的联系；（三）地方自治问题。

1871年统一以后的德国，是容克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专制国家。皇帝拥有内政、外交和军事等绝对权力。帝国议会只不过是专制制度的遮羞物。德意志帝国宪法和1850年的宪法一样是反动的。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应该成为德国党

^①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91年6月29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19—120页。

首位的迫切要求。然而德国党由于害怕刚刚废除了的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令”的恢复，竟不敢提出这一点。因此恩格斯说：“这里没有说本来应当说的东西”。^①

德国党的庸人们根本不懂得建立民主共和国对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对于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重大意义。据他们看来，似乎在君主专制存在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也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显然是毫无根据的幻想。恩格斯在《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中以及当时他的许多信件中曾反复阐述了在德国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必要性。他说：“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不仅如此，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②

如果说德国党的领袖们不敢提出共和国的要求，是企图讨好容克地主资产阶级；那么他们异想天开地提出在连“共和主义的”纲领都不许可的德国条件下，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则纯粹是欺人之谈了。恩格斯批评说：他们就“不问一下自己，是否这样一来，这个社会就会不象虾要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要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长出来，就会无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是否除此之外，这个社会在德国就会无须再炸毁那还是半专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③在这里，恩格斯已经异常清楚地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依靠暴力手段的思想。

① 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2页。

② 同上书，第274页。

③ 同上书，第273页。